

九、隐蔽战士传略

屡遭磨难 矢志不渝

——记杨甫

杨甫，原名吴世栋，曾用名胡宏盛、杨昌龄、刘德才，代号“三叔”。1908年10月14日，杨甫生于广东省海南岛琼海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926年，在琼东县立中学读初中时积极参加海南的大革命运动，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为避开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党组织安排杨甫等转移马来西亚继续进行革命活动，领导青运、工运，后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引渡回国，在广州坐牢。1936年出狱后在广州湾（湛江）晨光小学教书。



杨甫

1940年，杨甫到中共广东省南路特委工作。那时候南路特委刚成立，杨甫任特委常委、宣传部长。鉴于日寇已占领钦邕线的广大地区，钦廉四属和桂南一带成了敌占区和前线，广东省委决定成立粤桂边区工委，开辟粤桂边抗日游击根据地。工委由周楠任书记，杨甫任组织部长，余明炎任宣传部长。杨甫和余明炎于1940年冬先后到达合浦。后来由于形势发生变化，日寇从钦邕线撤退，广东省委撤消粤桂边区工委，余明炎调走，杨甫则留在合浦，以南路特委常委的身份领导钦廉四属党组织的工作。

在合浦，杨甫积极领导白石水抗日武装自卫斗争。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随着全国反共逆流的高涨，国民党合浦县当局又蓄谋对白石水游击根据地发

动新的军事“围剿”。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杨甫和合浦中心县委决定采取对策：一、用白石水人民抗日自卫武装部队的名义，发表《敬告合浦人民书》，揭露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重申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的原则立场；阐明白石水人民抗日自卫斗争的实质，表明人民武装自卫同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这份传单在钦廉四属地区乃至南路地区大量印发，广为宣传，在政治上影响很大；二、通过各地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秘密捐献枪支、弹药、现款和衣服、药品，帮助自卫武装队伍解决困难；三、充实骨干力量，加强对武装自卫斗争的领导；四、发动常备武装中队利用战斗间隙，开展生产自救，坚持艰苦奋斗。2月上旬，国民党广东省第八区保安队副司令陈国勋率领1000余兵力，对白石水进行第三次“围剿”。敌人以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手段，大放和谈烟幕，妄图诱降。在上级党委的领导和指挥下，白石水自卫武装队伍严阵以待，并指派张世聪与陈国勋进行针锋相对的谈判，揭穿其“和谈”阴谋，迫敌不敢妄动，再加上日寇在北海登陆，陈国勋慌忙撤兵，第三次“围剿”破产。

后来，广东省委下令把白石水武装自卫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杨甫虽有不同见解，但还是从纯朴的感情出发，坚决执行这一指示。他从南路特委接受指示后即赶回合浦，召集中心县委成员在白沙宏德小学开会，传达贯彻。会议根据上级指示布置：埋藏封存武器；安全转移已暴露的党员骨干；对地方的党员、群众做好说服工作，并准备应付敌人的再次进攻等。会后不久，部队解散了，直接领导这场斗争的张世聪、陆新、朱澜清、卢文等相继调离。坚持1年4个月的波澜壮阔的白石水武装自卫斗争主动停止了。

此后，杨甫领导钦廉四属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艰苦地培养和积蓄力量。杨甫还亲自举办党员训练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如1942年7月，杨甫在白沙宏德小学举办各区委领导参加的整风学习班，学习党中央的整顿“三风”文件，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整风运动。学习班结束后，各区委、支部普遍开展整风学习，使全体党员普遍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有效地增强了党性，巩固了党的组织，提高了战斗力。

1944年夏天，杨甫为了便于同各地党组织联系，以社会职业掩护地下斗争，在合浦廉州开设永信烟庄，作为钦廉四属党组织的联络机关掩护点。杨甫化名刘德才任烟庄老板，安排党员伍朝汉等分别任经理和店员。烟庄开业后，以专营烟丝之便，经常同合浦、灵山、钦州、防城各地党组织负责人或交通员联系，传递情况和书刊，部署工作，对钦廉四属党的建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9月22日，永信烟庄被敌人破坏，伍朝汉等3位党员被捕，杨甫在地下党员余富茵和陈耀琪的掩护下，逃脱敌人的搜捕，安全转移。史称“永信烟庄事件”。事发后，南路特委停止钦廉四属党组织生活，对杨甫和钦廉四属党组织进行审查，后来作出结论：烟庄事件是杨甫政治思想麻痹，被敌特破坏造成，并不是内奸叛徒出卖。永信烟庄事件的发生，给钦廉四属党组织的工作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教训极其深刻。

1945年10月，南路特委决定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主力第一团（惯称老一团）西进十万山，以保存骨干力量，发展和扩大十万山游击根据地。杨甫时任老一团政治督导员，联系各地党组织选定敌人力量比较薄弱而且又容易提供给养的进军路线，西进十万山。合浦、灵山、钦州各地党组织发动沿途群众积极筹备粮、草，提供情报和向导；各地武装队伍还积极配合，牵制敌人，确保了老一团顺利到达十万山。老一团的西进，使处在困难时期的合浦、灵山、钦州部队和人民群众深受鼓舞，增强了斗争胜利的信心。

杨甫在领导合浦以至钦廉四属地下党的5年间，付出了艰辛，成绩显著，在党员和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屡遭磨难，曾被国民党逮捕坐牢受苦；解放后在政治上又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正确地看待这一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已进入古稀之年仍抱病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顾问，为史学工作贡献余热。

青史流芳 莞水长流

——记陈铭炎烈士

“共产党员好比一颗红色的种子，撒到那里，就在那里发芽、生长、开花、结果。”这是北海人民的好儿子、党的优秀基层领导干部陈铭炎的一句名言。他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理想，不愧是北海的一颗红色种子，流芳莞水。



陈铭炎

走上革命的道路

陈铭炎，1911年出生于广东合浦县曲樟多官塘村的一户有钱人家。父亲是个有名的中医，与国民党广东省高级官员陈铭枢^[1]是同宗室。他一心想儿子“光宗耀祖”，因此，待陈铭炎在家乡读了几年私塾后，就送到广州读书，直到大学，并委托陈铭枢“多加照顾”。可是陈铭炎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旨”去做，他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认识了曾生^[2]，并一起声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当北平学生爱国行动的消息传到广州的时候，陈铭炎即和同学们一道，振臂高呼“反对防共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1936年，陈铭炎毕业于中山大学，同年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学毕业后的一天，陈铭枢没有忘记老乡的嘱托，特地到学校来找陈铭炎谈话。他高兴地拍着陈铭炎的肩膀说：“铭炎，你大学毕业了，是个有用之才，今某县缺一县长，非你莫属！”陈铭炎听了婉转地谢绝了陈铭枢的“好意”，又继续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去。

1937年7月7日，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共中央“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的号召下，陈铭炎再也“闲”不住了。这年秋天，他由曾生介绍到广东惠阳任坪山小学校长，以教书为掩护，与同校老师黎柏枢（党员）、黎孟持（党员）及当地的

党员李少霖等组成了党支部。陈铭炎任支部书记，他以坪山小学为阵地，组织附近乡村的教师，白天教书，晚上办夜校，学时事，学文化，成立剧社，教唱歌，组织剧团，排练话剧。圩日，在街头作口头宣传，上演《下你的鞭子》、《东洋鬼子》等话剧。在这期间，陈铭炎还主编抗日救亡的刊物《坪潮》，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号召民众赶走东洋鬼子。他带领党支部的同志自编自印，每期印200份，发行到坪山一带，一连出版发行了10多期，对唤醒民众起来抗日，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

1938年10月，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后，曾生率工作组到达坪山。10月底，在坪山羊牯嶂李少霖家召开工作组扩大会议，正式宣布成立惠阳县工作委员会，由曾生任书记，陈铭炎任委员兼任坪山中心区委书记，并参与建立惠阳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做国民党驻军的统战工作。1939年7月，地方党和部队的党组织分开，陈铭炎任惠阳县委组织部长，活跃在惠阳县的坪（山）龙（岗）地区，继续从事地方党的工作。

[1]陈铭枢(1889-1965)，广东合浦人，民国时代国民党上将，曾带兵参加北伐，1930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2]曾生(1910.12-1995.11)，毕业于中山大学，曾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38年10月任中共惠（阳）宝（安）工委书记，1943年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员。

共产党人好比种子

1940年春天，阴霾漫天。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东江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别有用心地在东江掀起了一股股反共逆流，继限制“东团”活动、制造“博罗队事件”后，又企图以“集训”为名，企图对曾、王部队下毒手，妄图一网打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曾、王部队被迫向东移。就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惠、东、宝地区危难之时，陈铭炎来到东莞任县委书记。7月间，他与黄树佳（县委组织部长）、王士钊（宣传部长）、谢阳光（武装部长）、王河（妇女部长）等接上关系后，意识到在外患内忧中“没有一个坚强的党组织，是不可能把各方面力量组织起来，更谈不上领导群众，战胜逆流，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因

此在县委会议上响亮地提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加强党的建设，带领东莞党组织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道路。会后即分头到各区去传达和贯彻。不久，接到东江特委的通知，曾、王部队遵照中央“五·八”指示，重返东宝抗日前线。这时，陈铭炎即赴大岭山，和大岭山区委一起发动群众，做好部队重返大岭山的一切准备工作。

10月，当曾生率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挺进大岭山时，就受到大岭山的太公岭、大环、大王岭、大雁塘一带群众的热烈欢迎。11月黄潭战斗后，部队威信日益提高，陈铭炎抓紧有利时机，率领地方党组织的同志到部队慰问，并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兵源。一时间，出现了父送子、母送子、妹送哥的参军热潮。他还千方百计地把群众组织起来，为部队送粮、送子弹、送药物。为使地方党组织更有力地配合部队，陈铭炎特地在大岭山牛牯岭开办了一期区级干部训练班，培训了一批党员骨干，加强了区一级党的建设。他还关心《大家团结报》的出版，及时解决创刊时的困难。

在这前后，陈铭炎带头深入水乡，住在中堂小东向陈成来（党员）的家里，与原有党员李厚贤（六嫂）等接上关系，先后发展了一批党员。在小东向、潢涌、拔蛟窝、大埗、锦涡、高埗等乡村建立和健全了一批党支部，继而到温塘去，以县委交通员袁能的家为阵地，又发展了袁成等一批同志入党，壮大了党的力量，并沟通水乡和莞樟线党组织的联系，成立了莞樟线特别支部。

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陈铭炎还抱病在锦涡、温塘、厚街等地分别举办党员骨干训练班。这些学习班除组织党员学习刘少奇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米夫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年》外，他还亲自上党课，他说：“共产党人好比一颗红色的种子，要富于生命力，撒到那里，就在那里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并以《红军长征的故事》和瞿秋白烈士的英雄事迹教育党员，勉励大家：“要经得起严峻斗争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一个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他组织党员既学理论，又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训练班办得生动活泼，为各地培训了一批党员骨干。至1941年，全县党员人数已发展至500多人，壮大了党的组织。

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东莞县城沦陷后，国民党东莞、宝安两个县的县党部、县政府和国民党第七纵队邓琦昌司令部、徐东来支队部都相继迁到东莞县属清塘区的石马乡。在反共逆流中，他们秉承国民党东江当局顽固派香翰屏的意旨，伺机捕杀共产党人。为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逆流，1940年秋天，陈铭炎与清塘区委书记黄万顺研究，决心进一步办好广九铁路线上之石马赠产所和石鼓爱群医社两个情报点。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先后派罗惠舒、周爱莲到石马赠产所；派李琼珍、周玲到石鼓爱群医社，和早已打入国民党塘厦区署任自卫总队区队副、警长的共产党员罗涛取得联系，并把国民党第七纵队邓琦昌司令部的上尉译电员温巩章争取过来（后发展为共产党员），沟通了从国民党第七纵队邓琦昌司令部到国民党塘厦区署、石马赠产所、石鼓爱群医社、清塘区委会、县委和部队的联系。这个情报网负责北至常平、周屋厦，南至布吉、李朗，西至大岭山，东至清溪、谢岗一带的交通情报工作。凡是从邓琦昌司令部经温巩章手送出的情报，通过这一情报网，都能迅速准确地送到县委和部队那里，起到应有的作用。

石马赠产所的周爱莲则利用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香棣芳认她为“契女”的关系，经常深入国民党官员家中活动。有一次，周照例到“契爷”的房里，看到国民党大朗区分部密告大朗地下党的一份共产党党员的名单，知道大朗地下党的一部分党员已暴露，回来立即写好情报，连夜送给县委。陈铭炎接到情报后，立即采取了果断的撤离措施，使大朗的党组织及时避免了损失。1941年8月，周又深入国民党县长兼挺进支队长徐东来家里，与姨太太们打麻将，姨太太边打边说：“今晚不能玩得太夜，徐队长明天一早就要带人马去大岭山了。”周又通过这一情报网，连夜把情报送到部队，又一次粉碎了顽军的进攻！

陈铭炎常常教育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他说：“交通情报工作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它比明刀明枪地与敌人较量更为艰巨。”语重心长地启发大家“要在特殊的环境中学会特殊的战斗！”他从“特殊”工作的重要性到如何密写，如何收藏，如何接送，到万一出了问题该怎么办等，都讲得清清楚楚。因此，交通情报工作上没有出现过重大问题。从1940年下半年至1942年5月，陈铭炎直接领

导开辟的交通情报站就有：东莞县城（王河负责）、东坑（方东负责）、中堂（陈成来、梁厚贤负责）、马坑（丁仲田负责）、周屋夏（陈××负责）、常平（谢金仲负责）、石鼓（周履光负责）、陈村（卢焕光负责）等。为了打通从路西到路东、罗浮山、广州的交通情报线路，陈铭炎又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敌占区——石龙，开辟了石碣交通情报站（尹平负责），从而有效地沟通了县委与特委、区委、部队之间的联系。陈铭炎通过这些渠道，有效地领导着东莞党组织工作。

在斗争中，陈铭炎处处爱护党组织，关心同志。1941年5、6月间，清塘区委书记黄万顺不幸被捕。他接到情报后，立即和交通员一起赶到清塘区石鼓村，亲自与县委组织部长黄树楷研究，想方设法把黄万顺营救出来，并把他转移到大岭山去工作。1942年冬天，宝安大队后方办事处主任张作铭叛变，此人了解共产党打入敌人内部当警长的罗涛的情况。陈铭炎接到情报后，立即通知清塘区委帮助罗涛撤到马坑交通员丁仲田家掩蔽，然后又派自己身边的交通员把罗涛接到水乡来，安排在焦利教书，有效地保护了同志。

在艰难的岁月里

1942年5月，粤北省委被破坏。为防患于未然，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划分为一、二线。这时，陈铭炎负责二线县委的工作。1943年4月，一、二线县委又重新合并，改为特派员制，陈铭炎为特派员。在敌、伪、顽的包围中，县委根据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认为必须做好长期隐蔽埋伏的工作。而县委领导人中多是外地人，长期隐蔽在一个点上容易暴露。那么，应以怎样的合法身份来掩护活动呢？陈铭炎根据东莞地区农村普遍有土榨蔗糖的习惯这一情况，决定一部分人以做蔗糖生意为掩护，从事地下活动。说做生意，也不是真的做；说不是做生意，也要学会做。陈铭炎是外地人，他克服了语言不通的困难，有关蔗糖生意的“生意经”也练得朗朗上口，当他拿起一条甘蔗或一块糖砖的时候，也能应付自如。大多数的基层领导则以教师、小贩、商人或医生等身份掩蔽下来。陈铭炎还根据水乡土匪多，各据一方，与敌、伪、顽相互勾结的情况，派共产党员陈成来打入中堂土匪黎炳辉处；派莫润潮、黄嘉打入土匪莫耀处；派黎耀打入黄涌土匪黎林处，各自隐蔽。与此同时，在各地也派了

一些地下党员打入乡村政权里去当乡长或保、甲长，如派万明打入虎门镇当乡长等。陈铭炎经常教育大家：“这样做，一方面使我们较好地隐蔽下来；另一方面，又使我们取得合法身份。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工作，而不是消极地停止活动。”

在艰难的岁月里，陈铭炎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夏天，穿一身布衫；冬日，披上一件旧棉衣；雨季，带上一把黑布伞。身上值钱的物品只有一支旧钢笔和一块旧手表。出发时，还经常赤着脚走路。

1943年，温塘这个点暴露了。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陈铭炎便转到敌占区莞城沙地塘五十五号袁能的姨母处掩蔽。过了一段时间，又转到水乡古屋村古道的家里隐蔽。到古屋村后，由于天大旱，发生大饥荒，生活条件更艰苦。他坚持和群众一起吃地瓜、喝粥水、食野菜……为了度过灾荒，陈铭炎领导全县各级党组织行动起来，带领群众进行生产自救，种下了大批旱地作物和秋收作物。这时，陈铭炎还把一批自己翻印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送到基层党组织去，为各地党员输送了战胜困难的精神粮食。

就在这艰难的岁月里，部队弹药缺乏，陈铭炎以糖业商人的身份出现，领导水乡地方党组织的同志，秘密地把一万多发子弹藏在糖缸里，运往大岭山区，有力地支援部队袭击篁村，围歼麦浩，并粉碎敌人号称的“万人大扫荡”！陈铭炎直接领导的交通情报网向部队提供了“大汉奸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要从莞城到石龙‘视察’的情报”，使部队及时在莞龙公路上打得陈璧君落花流水，威风扫地，夹着尾巴逃回广州！

就在这艰难的岁月里，在东莞的大地上，从水乡到山乡，从平原到丘陵，普遍发展了一批“抗日大同盟”的盟员（党的外围组织），为1944年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夺取新的胜利

1943年12月2日，东江纵队宣告成立。1944年春天，党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恢复活动。此时，陈铭炎喜出望外，立即召开各区特派员会议，学习中央的指示，结合实际，分析当时的形势。经过一年多隐蔽活动的东莞党组织，已胜利粉

碎了顽固派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挫败了日本鬼子的疯狂进攻，战胜了严重旱灾，度过了艰难的岁月。不但使各级党组织基本稳定下来，而且还积累了丰富的“三角斗争”的经验。在新形势面前，他号召各级党组织“必须因势利导，对全县党员开展形势教育，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开展群众运动，配合部队，狠狠地打击敌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会后，即分头到各地去，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在全党同志的通力合作下，东宝地区迎来了抗日的大好形势。在解放区里，突出抓政权建设。这年春天，继东马乡政权建立后，接着在大坪、黄猹坑、梅塘、长山口、大朗、安和、保安、塘沥、凤岗、石马、樟木头等地也建立乡民主政权。1944年5月8日，在有名的马山战斗中，长山口民兵全力以赴地配合部队，包围了来犯之敌，打得日寇九留米师团大败而逃，敌伤亡60余人，日寇加藤大队长逃回樟木头后，因惨败没脸见天皇而剖腹自杀。6月25日，地方民兵密切配合部队雨夜打厚街，全歼伪护沙队，缴轻机枪4挺，步枪20余枝，俘敌中队长王沛雄等30余人。11月21日，水乡底涌民兵和妇女又密切配合部队，夜袭洗沙，全歼“抗红义勇军”第六团，毙伤敌兵60余人，俘敌团长李×等150余人，缴获轻机枪8挺，长短枪180余枝。

1944年秋，恢复东江前线特委，黄宇任书记，陈铭炎任组织部长，郑重为宣传部长。不久，特委在宝安沙鱼涌举办整风学习班，参加学习的学员是县级干部，学习班由黄宇、陈铭炎等主持，主要学习《学习与时局》、《整顿三风》等，为时3个月。这次学习班采取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的方法，达到党内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对东江地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很好的作用。

1945年7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陈铭炎受特委的委托，在惠阳沙坑、新圩一带开办东江地区区级党员骨干训练班，训练班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朱德的《解放区战场》、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为东江党组织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45年8月15日，陈铭炎在新圩从电台里收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心情无比激动。一心想尽快把这一胜利喜讯传达给东莞党组织，好让同志们分享这一胜利

成果的喜悦。于是，连夜带两个交通员到东莞去，但途经东莞境内的清溪三峰十二嶂时意外牺牲，年仅34岁。

在抗战8年中，陈铭炎为东江地方党组织作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在东莞县，他领导地方党组织的时间长达5年，旗山莞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同东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人们从心底里怀念这位好书记。

青史流芳，莞水长流。陈铭炎的光辉业绩永照千秋。

藏身敌内搞情报 隐蔽越南保战友

——记赵世尧

赵世尧（1917-1970.2），出生在北海市一个破落地主家庭，是北海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和中共北海地方组织重建人之一。

1929年，赵世尧考入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在学习期间，接受了革命思想，与思想进步的同学一起组织“未名社”秘密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革命道理。1933年春，他被推选为合浦一中学生会理事，发动和组织学生开展校内外抗日救亡运动。



赵世尧

1936年9月初，赵世尧在北海市政府教育科工作，动员抗日进步青年积极声援抗日军队惩办日本间谍中野顺三的行动，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北海人民的觉醒，振奋了北海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后，他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六十师政治部主任张梅生的安排下，以“北海市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在中山公园召开

“北海各界民众反对蒋介石政府亲日卖国外交政策动员大会”，发动全市学生、码头工人、驳艇工人和各界市民到海关码头抗议凌士芬到北海调查九三事件。9月底，赵世尧为了躲避国民党一五九师的追捕而转移广州。赵世尧在广州与张进煊、杜渐蓬认真总结了自1932年以来，北海地区进步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他们认为北海的抗日救亡运动有着高涨的政治热情，但缺乏党组织的领导，因此整个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还显幼稚；北海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同外地（主要是指广州）的革命运动、抗日救亡斗争互相联系，加强配合；要让北海青年学生到农村宣传抗日，发动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自此，赵世尧与张进煊、杜渐蓬在合浦同学会中积极开展活动，充实自己，寻找党组织。10月，赵世尧在广州邂逅符荣业。赵世尧向符荣业介绍了北海进步学生活动情况，并向其表达寻找党的组织和参加共产党的愿望。符荣业答应与赵世尧一起寻找党组织，并介绍赵世尧参加了广州地区工人运动，给赵世尧一些党的文件和书籍，其中有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的报告，共产党国际远东支部书记米夫著的《中国革命问题》、中共《八一宣言》等。符荣业还对赵世尧进行一些党的基本常识教育，如有关地下党活动的组织纪律教育，如何在同乡同学中物色可靠的人开展组织活动等。1937年1月，符荣业告诉赵世尧已在中山大学寻找到了广东地下党组织，并介绍赵世尧加入中国共产党。赵世尧入党后，仍由符荣业与其单线联系。从此，赵世尧在广州开始以中共党员身份从事发展党组织和工人运动工作。赵世尧通过合浦同学会，联系了一批家乡的进步青年，其中有苏翰彦、黄万吉、林施均等，指导他们学习革命理论，并串联受蒋介石排斥的第十九路军在广州的旧部，组建了抗日军人联谊会。

1937年春，符荣业离开广州到上海，与赵世尧的联系人改为周楠。周楠向赵世尧传达了抗战形势和广州工运意见，并在合浦同学会主持建立临时党小组，由赵世尧任组长。11月，中共广州市委外县工委派赵世尧回北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重建北海党组织的工作。由于赵世尧以往在北海青年学生中做了很多工作，享有很高威信，他回到家乡后，立即受到进步青年的欢迎，大家都愿意接近他，听取他对抗日救亡工作的意见。赵世尧便通过这些了解北海有关情况，从参加并

指导抗日救亡工作开始便物色积极分子，开展重建党组织的准备工作。1937年底，赵世尧由周楠介绍，经中共广州市委外县工委的推荐，前往香港参加党的学习班。在学习期间，赵世尧遇到中共南方工委书记张文彬，张文彬详细询问赵世尧在广州的工作、组织和活动情况，并向赵世尧了解北海、合浦方面的群众关系等。在香港短短的两个半月时间里，赵世尧认真学习和阅读了党中央的一批文件和毛泽东发表的文章，对抗日战争新形势、民族统一战线、群众工作和党建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于是，赵世尧急欲返回家乡开辟新的工作。赵世尧提出返回家乡工作，张文彬同意其先返回北海，然后再找人与之联系。

1938年2月，中共广州市委外县工委派赵世尧回北海，继续开展重建党组织的工作。赵世尧回到北海后，张进煊即通知赵世尧到廉州研讨重建党组织的工作，决定由张进煊、赵世尧、李英敏成立一个党支部，并商议分别在廉州、北海发展党的组织，赵世尧负责在合浦一中和北海发展党员。赵世尧在合浦一中发展的党员有庞自、郭芳（郭李晃）、谢王岗等。4月，成立中共合浦特别支部，赵世尧任组织委员，负责北海党组织的工作。9月，涠洲岛沦陷，北海成了前线，收集日军情况，及时监视和分析形势动态是中共北海地方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当国民党一七五师政治部主任林增华听取赵世尧汇报北海抗日团体工作时，对赵世尧提到的涠洲岛日军情况和海面走私情况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还交代以后有类似情况要及时向其报告，并提出成立一七五师政治情报组，要求赵世尧兼做情报组负责人。此事事关重大，赵世尧立即向中共合浦特别支部作了汇报。特别支部研究后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情报组调查涠洲岛海面日军活动情况，进行防奸防特工作。于是同意赵世尧加入情报组，并派庞达、郭芳、郭兆荣、罗刚、郭其英、周志刚、陈辉等一批党员参加情报组。情报组成立了中共支部，由赵世尧任书记，庞达任情报组组长。赵世尧利用军队谍报员身份从事地下党的联络工作，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11月，成立中共合浦县工作委员会，赵世尧任委员、武工部长，兼任北海党支部书记。至此，标志着合浦、北海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已取得很大的成就，已建立完整的集体领导机构和遍及全县重要点线的党、群组织。

1939年2月，成立中共合浦县中心县委，赵世尧任委员、武装部长，兼任北

海特支书记。赵世尧在开展重建北海党组织工作的同时，推动国民党北海市当局于1938年3月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北海民众抗敌后援会，赵世尧任总干事，积极发动北海各界人民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1939年10月，赵世尧到广东省委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分别到湛江、化州、廉江等地，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44年参加广东南路抗日武装起义，任南路人民解放军某支队一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

1945年2月，赵世尧因病从广东廉江青平返回北海治病。3月，病愈后到广西、广东边境欲归部队继续参加战斗，但找不到部队，只好重返北海。4月，赵世尧从北海转移到越南，寄宿于族叔赵从宣家。10月，赵世尧在越南邂逅吴其梅（越共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曾在北海的合浦一中读书，与赵世尧、符荣业等进步学生同窗），经吴其梅的推荐，赵世尧到越共华侨工委工作，并主持编辑越共中央出版的刊物《新越南》的华文版。接着，赵世尧派其弟赵世舜回国到湛江购买中文铸字机等，并嘱咐赵世舜到湛江见到庞自、符平等后，将赵世尧转移到越南的情况向广东南路特委报告。因此，在国民党当局实行“清乡”的严峻形势下，为了保存武装、保存干部，南路特委考虑到把南路无法隐蔽的党员、干部、武装人员转移到越南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决定派庞自到越南与越共中央联系，协调南路党员、干部、武装人员入越事宜。

12月，庞自到越南找到赵世尧，赵世尧介绍庞自与越共中央领导人认识，并把南路特委请求越共中央允许南路党员、干部、武装人员到越南隐蔽的事宜与越共中央领导人磋商，越共中央同意南路特委的请求。这时，南路各地的党员、干部、武装人员不断到越南隐蔽，从北海转移到越南隐蔽的有伍朝汉、冯德、郭芳、王克等，均经赵世尧的推荐，由越共中央安排工作。随后，赵世尧担任越南政治保卫局海防地区负责人，负责调查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在越南的活动情况。

1946年7月，陈恩（中共南路特委在越南的代表）派赵世尧前往香港，将越南革命概况及南路地区南撤人员的工作情况向周楠汇报。

赵世尧虽然曾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仍然坚持革命工作，千方百计回到党的怀抱。1949年，赵世尧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侦察参谋，积极支援南

下解放军解放粤桂边区。解放后，他先后在湛江市公安局、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工作。

打入敌内 密取情报

——记庞达

庞达，原名庞继业，字敬群。1913年5月出生于合浦县廉州镇一个商人家庭。1925年考入廉州中学新制14年班初中，1928年夏毕业。1929年考入广州市童子军教练员养成所；结业后考入广东省警官学校，于1931年夏毕业。

1932年春，庞达应聘到合浦第五中学（今公馆中学）担任童子军教练和体育教员。庞达做事冷静沉着，为人和气，还有一套应付旧社会各种人物的经验。五中校长周胜皋非常信任他，视为心腹。他和一杜（杜渐蓬）、两何[何世权（后改名李英敏）、何承蔚]非常接近，常常从这3个小兄弟手里借到一些进步书刊阅读，思想逐渐走向进步。



庞 达

1937年春，庞达到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任教。当时，周胜皋任一中校长，庞达利用他和周胜皋的“特殊关系”，将陈任生、韩瑶初、严福远、陈业昌、赵世尧、郭李晃等一批党员推荐到一中当教职员，为后来党组织在一中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8年6月，庞达经郭李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涠洲岛沦陷，北海成了前线，中共北海地方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收集日军情报，及时监视和分析

形势动态。在国共合作抗日形势下，中共北海地方组织派了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国民党党政军机关任职。国民党一七五师成立政治情报组，该师政治部主任林增华要求赵世尧兼做情报组负责人。后经中共合浦县工委研究同意赵世尧加入情报组，并派庞达和郭芳、郭兆荣、罗刚、郭其英、周志刚、陈辉等一批党员参加情报组。情报组成立了中共支部，由赵世尧任书记，庞达任情报组组长。庞达与情报组的党员利用这种特殊工作的便利，积极进行防特防奸抗日活动，并为党组织掌握敌、伪、顽（顽固派）各方情报和掩护党的干部做了许多工作。

1939年2月，周胜皋兼任国民党合浦县党部书记长。周对曾支持他任合浦一中校长的庞达、陈任生有好感，便提出要庞达或陈任生随他到县党部任职，协助他工作。陈任生则以中共合浦县委委员的身份派庞达到国民党合浦县党部任职。周胜皋对庞达一直都十分信任，任庞为主任干事，并对庞言听计从。庞达利用与周胜皋的这种关系，推动周胜皋任合浦县青年抗日先锋总队的副队长（只是挂名，不管实际工作，总队实际领导权掌握在中共合浦县委领导何世权手中）。因此，周胜皋支持和参加了合浦县抗日青年代表大会，并将国民党一些重要情报及时转交中共合浦党组织。此期间，庞达先后与中共合浦县委领导何世权、陈任生、李士洋等单线联系，他利用职位上的便利，将国民党内动态，各种反共密令等情报信息转送给中共合浦县委。不久，庞达接到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下发合浦县政府的密件《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立即秘密转送给中共合浦中心县委领导人李士洋、陈任生、何世权阅看，使中共合浦中心县委能及时知悉国民党顽固派图谋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动向，作出对策。

然而，1939年6月，发生了合浦“儒家巷事件”，中共合浦中心县委秘密联络机关被破坏，县委领导成员李士洋、陈任生、张九匡等5人被国民党逮捕。国民党顽固派觉察了庞达等人在国民党内从事情报活动。案发后，庞达和何世权把陈任生在案发前存放在庞达处的一包党的秘密文件连夜全部烧毁，并分头通知北海、小江等地党组织采取应变措施，避免了损失。

“儒家巷事件”发生后，周胜皋想到被捕的陈任生、张九匡都是庞达给他推荐的，十分恼怒，一怒之下，撤掉了庞达的教员和主任干事职务。

1939年夏，何世权等人撤离县城廉州，廉州党支部书记由庞达继任。是年冬，成立廉北区委，庞达任区委书记。随后，庞达把廉州、北海的党组织整顿好，局面逐步安定下来。

1940年6月，庞达到广东南路特委党训班学习，结业后留在湛江，在南路特委从事联络工作。半年后调到电白县，担任特支委员、特支书记，后又调到梅菪、水东、吴川一带从事秘密工作，公开身份是梅菪中学、川西中学、吴阳中学教员。1944年后，担任吴（川）、茂（名）、湛（江）沿海一带的特派员，建立了一支武工队。

1946年8月，庞达和东江纵队一起北撤山东。几个月后，调到华东局学习，结业后留在党校组教科任干事，后任四部组织科副科长。1948年夏随军至山东、江苏；1949年4月调到华东局组织部干部处任科长、副处长，后任财贸干部处副处长。

1955年，庞达调到北京，在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任巡视员；1957年后，先后任中央宣传部高教处（后改为教育处）副处长、中宣部办公厅主任等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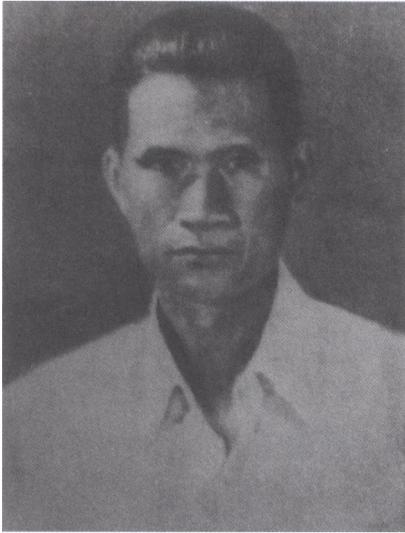
重建党组织 毕生为革命

——记张进煊

张进煊，1908年2月出生于合浦县白沙乡木岩塘村的一个农家。1924年初，考入合浦县廉州中学读初中。在廉中学习期间，张进煊结交了陈任生等一批挚友，并在以后的革命征途上成为亲密的战友。1928年暑期，张进煊和一些合浦青年怀着探求救国真理的强烈愿望，从北海乘船去省城广州，在白色恐怖的窒息气氛中度过2年预科的学习生活。毕业后，于193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中山大学农学院农学系农业行政专业。

张进煊在中大预科和本科学习的6年间，一方面勤奋学习，尽力吸收文化科学知识，准备将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一方面密切关注着国内外急剧变化的形势。1930年初，广州党组织还没有恢复，但是，在中山大学这所南方著名学府中，聚集了一大批像张进煊那样的思想进步、立志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优秀青年学生，他们为肩负起民族解放重任，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的革命书籍，接受马克思列宁

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深重，猛烈地敲击每个爱国青年的心。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更引起人们深深的忧虑。国民党当局还发起对主张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疯狂围剿。政治敏锐的张进煊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和腐败，满腔义愤地给以抨击。



张进煊

1934年夏，张进煊在中大毕业后，到广州农林局新造糖厂任技术助理，这期间，他和中大进步青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34年冬，红军被迫放弃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关系到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事件，牵动了张进煊等一群进步青年的心。1935年10月，红军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随即发布抗日救国纲领，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伟大号召。这像黎明前的曙光，给进步青年以巨大的鼓舞。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发生后，广州爱国学生迅速起来响应，张进煊和伙伴们积极参加示威游行，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36年1月的“荔湾惨案”中，学生死伤达100多人，中大学生纠察队队长冯道先（合浦人）就在此事件中惨遭杀害。他们目睹国民党反动派对爱国青年学生的残酷血腥镇压，无比愤慨！

1936年6月，张进煊由原中大同学钱兴[1]介绍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简称“中青”），并担任该组织主办的《时事周刊》编辑，任务是宣传抗日救亡，指导青年学生运动。1937年1月，再由钱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初，张进煊受党的派遣与参加中青年的李英敏（何世权）回到合浦，在

公馆中学教书。张任教导主任，与李英敏、张九匡建立合浦县第一个中青小组，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为重建党组织打下了初步的基础。1937年下半年，张调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工委委员。

1938年初，广东省党组织重新派遣张进煊回合浦开展党的工作，他在民主人士廉中校长蔡振玮、训导主任张存芳的盛情邀请下，回到母校廉州中学任教。4月，他与赵世尧、李英敏组成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或称中心支部），张任书记。至此，合浦党组织自1927年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而中断了11年后，又重新建立起来。张进煊在党组织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北海地区的民主革命运动发生深刻的变化。

早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运动在廉州、北海等地蓬勃开展。各地的青年学生深受影响，尽管大革命失败了，但共产主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进步的青年学生积极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廉州、北海各种马列主义读书会、学术讨论会和时事研究会十分活跃，为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特支成立后，就在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中积极地发展党员，不到半年时间，党员人数就发展到近100人。于是廉州、北海、公馆、西场、白石水、小江、寨圩等乡镇和一部分中学先后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造就了一大批能够带领群众战斗的骨干力量。

此时，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局面刚刚形成，但蒋介石消极抗战的影响还很深，汉奸、投降派的投降妥协活动异常猖獗；国民党合浦驻军一七五师政治部主任李焰生经常散布反共和对日妥协的言论，影响极坏。为唤起民众，团结抗日，张进煊和特支的党员在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发动和组织了“反对投降、团结抗战”的武装大游行。张进煊亲自策划并具体部署了这场有合浦县各界数千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大游行，大会群情激昂，愤怒斥责各种投降妥协和破坏团结抗战的言行。不久，在舆论的压力下，李焰生被调离，调来了开明进步、力主抗日、积极支持国共合作的林增华继任。林的到来，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策划组织反对叶天一接掌合浦一中（现北海中学）的斗争。叶天一原任合浦

五中校长，他提倡复古，思想守旧、反动，反对学校开展抗战教育，反对师生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要学生不问政治，埋头读书；诬蔑抗日救亡、团结抗战宣传活动为“奸党的赤化宣传”。叶的反动言论早已引起各校师生的愤怒和不满，但1938年8月，合浦县政府却委派他接任合浦一中校长，更加引起一中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反对。张进煊召开党员骨干会议，号召党员团结广大师生开展反对叶天一接掌一中的斗争，并具体部署了这场斗争。发动一中师生到合浦县政府门前静坐请愿，并发动县城的廉州中学及其他中小学校的师生支持和声援这一斗争。张进煊还通过其他党员骨干，做好争取上层人物的工作，迫使县政府撤消对叶天一的任命。反对叶天一斗争的胜利，争取到在学校内开展抗日教育和到校外开展抗日宣传的权利，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进入一中、廉中等许多中小学任教，有利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张进煊十分重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执行，他教育党员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壮大抗日队伍的力量，在特支全体党员的努力下，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部分上层人士的儿女或亲属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就在这段时间，许多党员骨干顺利地进入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工作，成为团结抗战的骨干力量。于是青年抗日先锋队、青年抗敌同志会、妇女壮丁队、战地服务队及各种救亡宣传队、歌咏队纷纷成立。合浦成为广东抗日救亡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搞得较好的县份之一，受到中共广东省委的赞扬。



北海桂园旧址——1938年2月，合浦党组织重建；同年12月广东省派周楠到此主持成立合浦县工委。

1938年9月，日军首次侵占涠洲岛，惨杀涠洲同胞100余人，6000多同胞逃离家园，流亡内地。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逃，大片河山落入敌手。在此危急关头，中共广东省委于11月派中共西南特委组织部长周楠来合浦指导工作，贯彻省委准备开辟钦廉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指示。为了适应急剧发展的形势的需要，省委决定把合浦特支升级为中共合浦县工委，在北海朝阳里桂园召开特支扩大会议，会议选举张进煊为工委书记。中共合浦县工委的成立，标志着合浦党组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会后，张进煊为建立农村抗日游击根据地，把大批共产党员调往农村，以教书或其他职业为掩护，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举办农民夜校识字班，发展扩大“抗先队”、“青抗会”、“妇救会”、“大刀队”、抗日宣传队、剧团等，在农村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时积极地发展农村党组织，一批主要骨干被派回各区加强党的领导：张世聪回白石水大成；邹贞业回公馆白沙；朱明（即罗秉森）回西场；陈业昌去寨圩；李英敏随后也去白石水大成；使这些区乡的工作迅速发展起来。由于日军不断侵扰，在县工委积极推动下，廉州中学和一中分校迁至合浦北部中心的小江镇，张进煊和陈任生也随校迁到小江，直接领导了合北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

1939年2月，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建立，李士洋任中心县委书记，张进煊任常委兼管民运工作。在张进煊的倡导和推动下，由抗敌后援会和抗先总队等联合倡议，由国民党一七五师政治部主办，于5月在合浦中部的张黄镇召开有100人参加的“合浦抗日青年代表大会”，张进煊亲临主持会务工作，会议大张旗鼓地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通过了严惩贪污、走私、汉奸和包围北海、保卫合浦等决议。这是一次成功的统一战线盛会。

6月16日，设在廉州儒家巷蔡屋的中心县委领导机关遭到国民党一七五师某部破坏，中心县委书记李士洋，组织部长陈任生等5人被捕。当时在廉州的中心县委委员李英敏立即赶往距廉州200多里的小江廉州中学报告张进煊。张作了必要的安排后，迅速水陆两路兼程赶往广州湾（现在的湛江）向南路特委报告，在特委遇到中共广东省委巡视员温焯华刚到广州湾，后由温前来合浦调查处理中心县委机关被破坏的事件。经过调查研究，温焯华于8月在白石水大成金街小学召

开县委扩大会议，根据上级指示和结合合浦情况，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山区，选举新的县委领导机关——中共合浦县工委（仍领导钦廉四属），选举张进煊为县工委书记，调整充实了廉北、公馆、西场、白石水、小江等区委和寨圩特支。张进煊临危受命，果断地转移已暴露的党员，实现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到农村的转移。

1940年2月，中共广东南路特委常委温焯华和来合浦工作的黄其江，在合浦县工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党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的精神，贯彻“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方针。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把反逆流的斗争同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结合起来。张进煊积极领导和部署这场斗争。会后，廉北区委和西场区委联合发动了数千人的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大请愿，斗争持续3天，迫使县长李本清接受群众“禁止运米出境资敌”和“压低米价，改善民众生活”等要求。4月，又在西场牛圩坡召开由1000余群众参加的“西场各界反汪救国大会”。5月1日，党组织在小江米行召开有2000多人参加的反对奸商运米资敌大会，会后示威游行，到小江镇公所请愿，随后又到江边各码头制止商人用竹筏运米出境资敌。同月，白石水区委发动1000余人在白石水圩边召开反汪大会，历数乡长梁文光贪污勒索、运米资敌等罪行。同时，在寨圩区，也在圩日召开了由上千人参加的反汪大会。在这些大会的影响和推动下，全县群众纷纷起来制止奸商运米出境资敌，形成波澜壮阔的反汪救国热潮。与此同时，在部分学校也发动了反汪反逆流的斗争。后来，由于国民党疯狂镇压群众爱国运动，以致爆发了著名的白石水武装自卫斗争。

1940年5月，张进煊调任广东南路特委委员兼茂名特支书记。张进煊到茂名（包括高州县和现在的茂名市，府治在高州城，是原国民党广东省第七行政区专员公署所在地）时，正值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热诚与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原七区专员、十九路军抗日名将张炎被迫辞职。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遭逮捕，抗日的学生队等民众团体被取缔，轰轰烈烈的抗日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茂名高州一带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到高州后，张进煊化装成商人，秘密住在城郊一位党员的家中，首先组织安

排已经暴露的党员和骨干撤退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区去掩蔽和工作，同时把未曾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组织起来，认真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保存了革命力量。

1940年下半年，局势基本稳定，张进煊和特支的其他领导在审查整顿组织的基础上，举办了多期党训班，对党员进行政治形势教育、共产主义思想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加强了党的建设。

1940年冬，南路特委决定成立茂名县工委，任张进煊为工委书记。张的原配妻子崔懿芬因病在家乡逝世，噩耗传来，张进煊无比悲痛，只好强忍悲痛坚持党的工作。

张进煊因患病的缘故，南路特委于1941年冬调他回赤坎（现在的湛江）特委机关负责党员干部的培训工作。1943年春，由于张病情严重，需要停止工作进行休养治疗，组织上决定让他回合浦家乡养病。家乡的群众热烈欢迎这位革命引路人的归来。即使在养病期间，他也从不停止为党工作。他经常向群众和党员宣传国内外的形势和党的政策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和贪污腐化、剥削压迫人民的罪行，并发动群众与反动分子作斗争。当时两甲水村的地主恶霸分子陈希文兄弟数人，侵占梅菪垌村农民的土地，并用武力欺压农民，弄得十几户农民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一次，合浦县法院院长廖北沂带人到梅菪垌现场勘察，并召集乡绅调解，陈希文等当即出示契约，宣称田地是他的，气焰十分嚣张。待他宣读完地契后，张进煊立即指出他的地契是伪造的，因为他宣称自己所有的六石种田地东南西北的界置，把彭屋、新田寮等村群众的田地、山林以及道路、桥梁都划入他六石种面积之内。总面积不少于百数十石种的田地，这明明是为了霸占别人田地而伪造的假契约！陈希文的阴谋当场被揭穿。此后，张进煊在当地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

1944年，日军南侵，打通了湘桂铁路线，使华南大部分地区变成敌后。中共广东南路特委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决定在南路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45年1月下旬，阮明和谭俊从南路特委接受起义任务回到合浦后，谭俊便首先到木岩塘张进煊家向他

传达，并一起研究了武装起义的计划和具体部署。张进煊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便发动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起义，并说服年迈的母亲，卖了盐田积存的盐，买了两支崭新的七九步枪，带上父亲留下的左轮，于1945年2月初，随公馆、白沙的起义队伍，经公馆、东成、张黄等圩镇，走了100多里进入白石水的大城山区。在金街岭岗村组编起义队伍，张进煊任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后改名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合浦大队副队长，随即率领起义队伍攻打白石水乡公所和张黄西镇公所，收缴了一批武器，开仓分粮济贫。



张进煊雕像

2月13日，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主力二支队800多人到达白石水大成的金街，原来领导白石水武装斗争的三支队长兼政委张世聪也和二支队一齐到达，二、三支队联合组成前线作战指挥部，张进煊被任命为政治部民运科长。紧接着，国民党为了扼杀这支新生的人民抗日武装，调来保一团、县自卫第二大队和正规军一五五师前来围剿。前线作战指挥部为了适应斗争需要，决定把大批非战斗人员分散到各地开展群众工作，张进煊等因此回到了白沙。

1945年6月至1946年夏天，张进煊在家一面治病，一面坚持做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为这个地区以后组织武工队开辟新区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1946年7、8月，上级党组织决定调张进煊到越南解放区广南省做华侨工作。张到达河内后，正在河内筹组粤桂边区的领导人周楠派庞自向张传达了指示和工作安排。张先在广南省华侨中学任校长，后来又和平定省解放区协助做好那里的华侨工作和各方面的联络工作。

1948年初，组织上调张进煊回国，他经西贡、香港、广州湾回到合浦家乡，通过当地的老党员、老交通员刘守仁很快便联系上钦廉四属特派员陈华，参加家

乡的革命工作。9月，粤桂边地委决定重新组建中共合浦县委，任张进煊为县委书记。

张进煊上任后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密切联系群众，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他常驻在白沙、公馆一带并具体指导这一地区的工作。这一地区群众基础较好，但也是官僚地主势力较强的地区。他根据这些特点发动和依靠广大贫苦农民，团结中间阶层，争取上层开明人士，对于敌对的阶级分子除极个别对党组织造成威胁的极端反动分子之外，一般采取争取中立的政策，不采取打击、消灭的政策。即使是国民党的乡保政权及其武装，也不随便推翻和消灭，而是争取使之变为“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例如，1949年春节，张进煊带领武工队开进充美村，召开群众大会，该村的乡绅和联防队长也来参加了。经过宣传发动，全村欢迎武工队到该村活动，保证联防队不妨碍武工队的工作。会后，有部分联防队员拿枪来要交给武工队，张进煊则对他们说：“现在不是要你们的枪，而是要你们保护好枪，不与人民为敌就行。”此后，联防队还帮助武工队和民兵放哨。由于采取这样的策略，白沙、公馆一带虽然反动势力较强，但党的领导机关和部队都能够在这里隐蔽和活动，从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到将要解放时，有不少保队和联防队转变成共产党的力量。

1949年4月，地委决定撤消合浦县委，分别建立合东南、合中北、合钦灵边等几个工委，此时张进煊病情转重，只好停职休养。

12月，粤桂边区军民配合南下大军，解放了全边区，合浦全县人民迎来了翻身和解放。刚刚解放时，面临着建立政权、清剿土匪和支援大军解放海南岛等繁重的任务，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建立了各级支前司令部。为了保证粮食的供给，合浦抽调大批干部、师生组成征粮队，张进煊又带病担任征粮总队政委。这是一项新的、极其繁重的工作，他病弱之躯又重新焕发出旺盛的精力，废寝忘食地工作，保证了征粮支前任务的胜利完成。

解放后，张进煊一直疾病缠身，但仍带病为党工作。张进煊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崇高品质，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1] 钱兴(1909-1948)，广东怀集县人，1933年进入中山大学读书，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

共中山大学支部书记、厦门市工委书记、漳州中心县委宣传部长。1940年冬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1948年任中共粤桂湘边区工委书记兼边区部队副政委，同年冬在战斗中牺牲。

丹心贯红日 血洒大窝山

——记张世聪烈士

投身革命

张世聪，乳名云生，字学明。1909年8月出生于广东合浦县白石水（今广西浦北县大成镇）勾刀水村，排行第二。他家世代以农为主，到了父辈兼经商，生活稍为充裕。后因匪乱，其父被匪杀害，兄弟3人全靠母亲抚养。



张世聪

张世聪8岁开始读私塾，1928年秋考入广东省立第十一中学（今廉州中学），1935年8月考进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在中大就学期间，他追求进步，积极参加“读书会”、“研究会”等群众组织活动，曾聆听过章乃器、陶行知、王造时、叶剑英、廖承志、潘汉年、郭沫若、茅盾等的演讲，受到革命思想的陶冶。1935年冬，北京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广州各大中院校师生热烈响应，举行示威游行，张世聪在游行中勇敢地与国民党军警进行搏斗。

1936年冬，张世聪由陈任生介绍加入中国青年同盟。1938年，他担任中大青年抗日先锋队第三小队副队长。同年5月，由黎永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时，张世聪看到祖国的大片河山相继沦陷，深感不安，决心放弃学业，投

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7月暑假期间，他积极参加由中共合浦县特支领导的廉州高中、初中学生的夏令营活动，与特支书记张进煊等分别担任《论持久战》、《社会发展史》等专题讲座及军事常识训练，以团结教育广大知识青年，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0月，张世聪受合浦党组织派遣，回家乡白石水以教书为公开职业，与朱澜清、许家骅等党员一道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后对原有的党支部进行改组，张世聪任支部书记。他非常注意在农村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仅勾刀水村，经他和岑月英亲手培养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就有张燮芳、张体钦、张体礼、朱玉光、张世伯、张世瑶、黄池江、黄家禄、黄家祚、黄大哥、朱菊清等10多人。党支部改组后，在张世聪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活动。他致力于教育事业，得到当地开明人士的信任和支持，很快就同时担任了东馆、金街、红岭、白石水等4间小学的校长。他利用这一合法职位陆续安排李英敏（何世权）、岑月英、王克、卢文等近20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担任这些学校的教师。这些党员一边教书，一边开展抗日宣传和党的秘密活动，组织同心会、兄弟会，使广大民众紧密团结起来。

张世聪在家乡工作期间，常常头戴竹笠，脚踏草鞋，身穿粗布衣，带领青年教师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帮做农活，替受冤屈者写状纸，鸣不平，启迪群众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深得群众信任和尊重，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张二叔”。特别在他兼任4间小学校长后，经常来往于各学校间或到各个乡村了解情况，几乎要日走数十里，累得他日渐消瘦。人们看在眼里，心生怜悯之情，串连各校董事，私下捐款拟买马为其代步。事情很快传到张世聪耳里，他分别登门拜访，表示心领乡亲好意，但坚决说服大家不要因为买马花费钱粮，增加负担，制止了买马的做法，更加得到群众的信任。

领导白石水反运米资敌和武装自卫斗争

1939年6月，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机关遭到国民党合浦县当局破坏以后，党组织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山区，建立农村根据地，着手组建白石水区委，派县委成员李英敏来担任区委书记，张世聪任统战委员。在区委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活动。此时，日寇占领了涠洲岛，随时准备在合浦沿海登陆，国民党

合浦县当局不但不领导人民抗日，反而积极反共，压制人民的抗日运动，并借机横征暴敛、贪污勒索。国民党白石水乡长梁文光更是疯狂地横行乡里，作威作福，群众无不切齿痛恨。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庇护下，当地官吏奸商趁机抢购大米，私运出口资助日寇，使地方米价暴涨，饥荒蔓延。在这严重的关头，张世聪和朱澜清根据党的指示，于1940年5月，发动和组织白石水、大成、旧州一带的群众2000多人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揭露国民党汪派汉奸卖国的罪行，开展反对倒退，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向白石水乡公所请愿，要求惩办勾结奸商运米资敌的梁文光和旧州乡长吴质平，抑制米价暴涨，动员各界一致抗日。在群众的压力下，国民党合浦县当局被迫撤换梁文光和吴质平，斗争取得了胜利。接着，张世聪等又发动和组织群众拦截大米出境资敌，就地平价售给群众，帮助广大群众渡过青黄不接的“四月荒”。国民党合浦当局却认为这是“大逆不道”，遂派张黄区长黄南宾为说客，花言巧语进行拉拢。黄对张世聪说：“张先生，你乃是个堂堂大学生，有用之人才，做个小学校长岂非屈才？到政府去做事，可以大显身手嘛！你若同意，包在鄙人身上。况且目下奸党作乱日甚，此间乡民无知，聚众滋事者有之，先生幸勿上当！”张世聪听了这既是引诱又是威胁的言词之后，毫不客气地说：“我读大学并不是为了做官，大敌当前，国危民忧，那些做官的不但不去抗日，反而勾结奸商抢购大米、铜元等物资去资敌赚钱，发国难财，这是何等可耻行为！我决不会与这些人同流合污。你如果是个称职的说客，还是由你说说那些当官的吧。群众起来抗日除奸，这是爱国的自觉行动，怎么能说是聚众滋事？”黄南宾理屈词穷，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国民党顽固派拉拢张世聪不得逞，恼羞成怒，便撤消其白石水中心小学校长的职务，但这更加激怒了广大人民群众。

合浦县长李本清在派兵镇压小江、西场的“米案斗争”之后，又要对白石水实行武装镇压。中共合浦中心县委书记黄其江同白石水区委成员王鉴远、李英敏、张世聪等研究，决定遵照党中央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由张世聪出面组织农民武装自卫。6月2日，白石水，大成、旧州、张黄等地的武装民兵和群众以及学校师生共1000多人，汇集在大成的枕檬

坳大草坪参加“团练”誓师。会上，张世聪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动员演讲，大家听后群情激昂，同仇敌忾，一致表示与敌血战到底。随后，张世聪担任白石水武装大队大队长，领导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武装自卫斗争，至1941年2月，先后三次粉碎了合浦国民党顽军对白石水的“围剿”，帮助群众恢复家园。



1940年6月，被国民党顽军洗劫一空的勾刀水村张世聪故居

在白石水武装自卫斗争期间，张世聪及其一家为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卫斗争初期，张世聪常派人回家里拿钱、挑粮食出来支持部队，还卖田产买武器，改善队伍装备。李本清率兵“围剿”时，张世聪家的房屋全被烧毁，财产被洗劫一空；胞弟张世柏（共产党员）遭顽军袭击而中弹牺牲，年仅22岁；亲嫂避难在山中分娩，母子中风双亡；胞兄张世河遭此浩劫，神经失常，流浪外地，惨死他乡；张世聪的妻子处境艰险，面临顽军要斩草除根，她带着3个幼儿，改姓埋名，绕山涉水到亲戚家避难，过着飘零的生活。张世聪的老母亲是位刚强而慈祥的老人，尽管早年丧夫，孤儿寡母在苦难中熬了过来，可是面临顽军的残害，小儿子牺牲，大儿子神经失常而不知去向，大媳妇及孙子双亡，二儿子张世聪被通缉等家破人亡的惨剧，她再也承受不住了，终于悲愤交加，含恨而死。张世聪的旁系亲属也受株连，他的亲叔张金声先后三次被捕坐牢，受尽折磨。一桩接一桩的惨剧，犹如一把把尖刀刺向张世聪的心窝，不少乡亲为之落泪，但他并不因此颓丧，反劝乡亲不要难过，他说：“遭此劫难受害何止我一家？瓦房烧了，将来住洋楼；抢了土布，将来穿丝绸。穷人翻身解放这一天，不久就会到来。”他还开导群众：“要革命，总会有流血牺牲的。今天付出的代价是为了明天的幸福。我们主张抗日救国，何罪之有？可国民党顽固派却说我们聚众造反，出兵打我们，践踏我们的家乡，烧毁我们的村庄，杀害我们的亲人，使我们蒙受了深重灾难，

我们要记住这笔血泪帐，定要为受害者伸冤，为死难者报仇，誓死保卫我们的家乡！”张世聪化悲痛为力量，鼓起精神，继续带领部队与顽军血战。他这块钢在战火的洪炉中越炼越坚强。

在敌人第二、三次“围剿”期间，顽军经常四出搜捕，白石水武装队伍常驻山上，弹药、粮食、经费都发生严重困难。部队党组织决定生产自救，张世聪和陆新遂率领 20 余人，转移到麻风窝、割板麓一带。他俩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与战士们一道伐木烧炭，砍竹编织，造纸，修木屐卖等，共渡难关。

1941 年夏，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白石水武装自卫斗争转为政治斗争，解散队伍，撤退干部。张世聪所带领的这支队伍被迫解散，而武装民兵和游击队员仍集结在山头上，纷纷请战，表示要跟“张二叔”一起与敌人血战到底。许多人感到失望和痛心，抱着枪杆失声痛哭。张世聪含着热泪劝慰曾经和自己生死与共的人民子弟兵要服从上级的决定。

转移遂西抗日

1941 年 11 月，中共广东南路特委调张世聪到雷州半岛工作，暂时安排在遂溪县界炮镇的老马村小学做杂工，为学校打钟、扫地，为教师们做饭、照顾小孩。后来，组织上安排他在该校当教员，以教学作掩护，继续秘密开展地下工作（负责军事）。在那里，他改姓黄，当地人叫他“黄先生”。他常常到群众中与穷兄弟们同食同住同劳动，一道参加围海造田，挑土，推车打夯。晚上，他到群众会聚的“大话馆”去了解情况，谈心事，宣传革命道理，讲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启发农民提高阶级觉悟，指引他们走革命道路，很快就成为当地群众的知心朋友。

1942 年 2 月，日军在雷州半岛登陆，张世聪根据党组织的部署，在老马地区发动群众，并派人到灵山等地买回大批土造七九、拉八等枪支、弹药，组织“武装联防队”和“锄奸小组”，开展锄汉奸、打顽军、杀日寇、破坏敌人交通线等一系列活动，使这支队伍迅速成为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1943 年秋，遂溪、海康沦陷，投降派周之墀纠合一伙民族败类，自封“团长”，其妻陈惠珍任团副，勾结日军，攻打抗日游击队，烧杀抢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9 月 22 日，张世聪根据确凿的情报，与陈兆荣、叶大林、马康胜率领一支队伍，化装成农民，乘周

之墀夫妇在赤坎仔村宴饮之机，潜入该村，当场击毙了周之墀。陈惠珍却溜走了，其后接任“团长”，继续作恶。

1944年2月2日凌晨，老马、杨柑两地的游击队在张世聪率领下，会同黄其炜中队，奔袭杨柑圩东边田，活捉了陈惠珍及其“部下”10余人，缴获10多枝长短枪。张世聪当即进行火线提审，追问陈惠珍最近购进一批新枪支弹药的下落。陈惠珍装傻扮懵，不肯吐露实情。后张世聪等从其他俘虏的身上找到突破口后，陈惠珍才为了保住性命，从实招供。

当天下午2时左右，张世聪和黄其炜带领两个小分队，按陈惠珍口供所说的藏枪地点，抄小路直奔白水塘附近的一座旧砖窑。可是，当他们来到离目标约有50米时，遭到了日军的伏击。

原来，游击队于凌晨袭击东边田时，由于没有全歼敌人，漏网的伪军逃往北坡圩，向占据北坡的日军报告了他们被袭击的情况，并要求日军立即派兵前往白水塘，把藏在旧砖窑里的枪支弹药挖走。日军怕这批枪落到抗日游击队的手中，急忙倾巢出动，于当天上午11时挖走了枪支，并不动声色地隐蔽在松林里，伺机伏击前来取枪的游击队。

战斗打响之后，由于日军人多装备好，并且占领了有利地形，而抗日游击队却处于低洼地带，周围的掩体比较少，张世聪率队边战边撤，黄其炜等8名指战员相继壮烈牺牲（其中3人负伤后被杀害）。战斗至天黑时，张世聪撤进白水塘，两腿先后中了敌人的3颗子弹，他强忍剧痛，潜游至侧边的杂草丛下静伏，借着夜色躲过了敌兵的追捕。敌人撤走后，他强忍伤痛，爬行9里荒野，来到后田村西北面的乾留村村边。这时，他的两个膝盖已被磨掉皮和肉，露出了白白的骨头，终因失血过多及饥寒交迫，而昏倒在一间鸭寮旁边。看守鸭群的老农陈发发现他后，心想他一定是白水塘战斗的英雄，便急忙用牛车把他送回老马村。半年后，张世聪伤势痊愈，又重返队伍，继续战斗。

血洒大窝山

1944年冬，日军打通湘桂线，广东南路已沦为敌后。中共广东南路特委根据南方局的指示，于1945年春节前后，在整个高雷、钦廉地区全面举行抗日武装

起义。

高雷起义后，南路特委组建了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张世聪任第三支队队长兼政委。1945年2月上旬，合浦、灵山发动了武装起义，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支队随主力二支队开返合浦，领导钦廉四属武装起义。除夕前夜，二支队到白石水后，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纵队参谋长李筱峰主持二支、三支骨干会议，宣布成立前线作战司令部，黄景文任司令员，张世聪任副司令员，统一指挥二、三支队和合灵部队作战。

当时，二支队在白石水地区立足未稳，三支队未及进行整编。2月15日（农历年初三），国民党顽固派调集广东保安第一团和合浦县第二自卫大队及乡保队1000多人跟踪追击，其正规军一五五师也从广西方向压来，向驻金街的二、三支队进攻，妄图消灭这支新生的人民抗日队伍。二、三支队被迫应战一天，战斗十分剧烈。由于双方力量众寡悬殊，黄景文、张世聪遂率队撤离金街。2月17日，张世聪率黄河大队连克旧州、白石水乡公所，又挥戈北上，转战马栏、龙门、小江。大军扫除沿途顽军据点之后，于马栏开仓济贫，群众同声赞颂张二叔的部队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好队伍。

2月底，钦廉四属党组织领导人阮明牺牲，经南路特委决定，由张世聪接任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员兼军事特派员。因兵力对比悬殊，二、三支队处境异常困难，前线司令部决定，由李筱峰、黄景文带领二支队大部人员东返高雷打击日伪；留下二支队的黄河大队和三支队的骨干，由张世聪指挥，在钦廉地区同顽军周旋，坚持战斗。

这时形势愈来愈恶化，顽军到处屯兵，封山搜村，分割合围。为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张世聪命令黄飞带领马俊英、陆之钦两个中队撤到张黄一带活动，只留下黄家祚中队跟随司令部，并将队伍转移到比较偏僻的大窝山一带。

5月6日清晨，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一五五师四六五团包围了大窝山。张世聪当即与谭俊、陈明景等紧急商讨对策，并集队进行动员。他以1940年白石水武装自卫斗争事例教育大家说：“那时候，我们虽没有现在那么多人，那么多武器，却打得敌人无法对付我们，最后要求跟我们谈判。我们有党的领导，有群

众的支持，是能够大败敌人的。我和你们一起战斗，一起打击敌人！”大家激动地举手发誓：“坚决消灭敌人！”

大窝山地势险峻，群山环抱，林木繁茂，杂草丛生，有利于部队隐蔽。但时逢夏初，连日苦雨，张世聪率领的队伍在深山密林中行动有很大的困难，而且因道路泥泞，行军过后留下脚印，几个营的顽军顺着足迹追上山来，凶猛地扑向张世聪队伍隐蔽的地方并到处射击。在这关键时刻，张世聪镇定自若地指挥队伍在深山密林中与敌周旋。当时，一部分队伍伺机冲出了外围，但大部分人还处于顽军的包围之中。下午，敌人还在搜山，张世聪指挥部队撤退，他自己为部队断后，用两枝驳壳枪轮番射击，拖住了顽军，使队伍得以顺利撤退。队伍撤出很远了，仍然听到一阵阵激烈的枪声。

经过一天苦战，天黑了，敌人收兵了。张世聪的队伍陆续到山下汇集，却不见支队长回来。尽管老百姓为他们做好饭菜，每个人也饿得饥肠辘辘，但谁也无心去尝试一口，大家都为自己的领导人没有回来而着急，一些战士甚至走到当日战斗过的山头麓沟，急切地寻觅自己的亲人——张二叔。共产党员叶梓才、朱八（朱香廷）踏遍了山头，终于发现张世聪的遗体，他俩悲痛欲绝。

张世聪牺牲后，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党组织采取保密措施，对他的死讯秘而不发，仍然以他的英名号召群众，威慑敌人，因而合浦、灵山一带常传闻“张二叔回来了！”“张世聪又在指挥打胜仗啊！”国民党合浦县当局一时风声鹤唳，信以为真，把所驻的村庄闸门关闭，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弄得惶惶不可终日。其后，第八专区保安司令陈国勋到芳塘“驻剿”，还到处张贴告示，悬赏法币50万（光洋1000块），缉拿张世聪。直到1951年，在大窝山找到了当年朱八、叶梓才以“三石为记，毛毡裹尸为葬”的烈士坟后，合浦县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才沉痛地发布张世聪的讣告，并在白石水大成老区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合浦人民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

后来，浦北县委、县政府在张黄镇修建了“张世聪烈士纪念碑”和铸造了“张世聪烈士铜象”，大成镇政府还把大成中学命名为“世聪中学”，并建了“张世聪纪念馆”，供人民瞻仰。